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

农民工流动及其心理成本问题

宋福荣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4年10月

国内图书分类号：F304.6

国际图书分类号：331.55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

农民工流动及其心理成本问题

硕 士 研 究 生： 宋福荣
导 师： 梁雪峰副教授
申 请 学 位： 公共管理硕士
学 科、专 业： 公共管理
所 在 单 位： 黑龙江省统计局
答 辩 日 期： 2004 年 10 月
授 予 学 位 单 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

Classified Index: F304.6

U.D.C: 331.55

A Dissertation for the Master Degre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ITS PSYCHIC COST

Candidate:	Song Furong
Supervisor:	Associate Prof. Liang Xuefeng
Academic Degree Applied fo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pecial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ffiliation: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Statistic Bureau
Date of Defense:	Oct., 2004
Degree-Offering-Institutio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摘要

本文把农民工流动问题作为典型的公共问题，分析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探讨政府公共性作用，提出政策性建议。

以往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的研究，大多基于城乡收入差异分析范式，但成本收益分析表明，这种范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阶段农民工流动动机。笔者通过对国外农民工流动模型的比较，从一个新的视角——心理成本角度，对农民工流动进行尝试性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心理成本影响农民工的流动，并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将影响心理成本的因素分解为制度、信息和教育 3 个层面上。

问卷分析结果表明，作为正式约束的制度与其衍生出来非正式约束——城市居民的观念，共同加大了农民工流动的心理约束成本；打工信息的路径依赖和不对称性，使得信息的搜寻成本巨大，增加了农民打工期望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大了农民工流动的心理风险成本；农民工的低教育水平导致了低素质，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城市中获得工作的机会，加大了农民工流动的心理适应成本。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政府要发挥公共性的作用。首先，政府更需要从观念的层面上，对非正式约束实施影响，以缩短其变迁时间，从而降低农民工流动的心理约束成本；其次，政府要通过协调机制保证农民工收入可实现性和降低打工信息的搜寻成本，从而降低农民工流动的心理风险成本；最后，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向农村倾斜，加强对农民的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降低农民工流动的心理适应成本。

关键词 农民工流动；心理成本；农民工调查；政府公共性

Abstract

Rural labor migration is raised in this thesis as one of typical public issues.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factors which restricted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discussed the commonality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finally proposed his own advice on possible policies.

Different with other studies on rural labor migration, which are mostly based on the paradigm of different revenue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e author made a comparison with models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some foreign countries and tried to explore from a new viewpoint, say Psychic Cost. On the basis of the hypothesis---Psychic cost, the author divided it into 3 determinants, namely institution,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he author adopted the methods of a rural labor questionnaire. and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psychic cost on rural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finally came to the conclusions: firstly, the institution as formal constraints, together with the notion of urban inhabitants as informal constraints increased the psychic constraint cost of rural labor; Secondly, it is resulted from the increasing cost of searching information caused by the dependence and dissymmetry of the paths to information that rural labor expanded their expectation of income and consequently extended the psychic venture cost; thirdly, lower-level of education led rural labor to the limitation of employ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psychic adjust cost.

The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genuine rural labor migration. It is advised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which deeply influenced rural labor migration. It is also advis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some actions to reduce the psychic cost of rural labor.

Keywords rural labor migration; psychic cost; rural labor questionnaire; the commonality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第 1 章 绪论	1
1.1 农民工流动问题界定	1
1.1.1 农民工概念	1
1.1.2 农民工流动的界定	2
1.2 研究农民工流动问题的重要意义	3
1.3 国内外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研究综述及评价	4
1.3.1 国外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研究综述	4
1.3.2 国内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研究现状	5
1.4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	6
第 2 章 农民工流动历史综述	7
2.1 农民工流动进程综述	7
2.1.1 农民工流动简要历史回顾	7
2.1.2 黑龙江省农民工流动进程与特点	8
2.2 农民工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9
2.3 农民工流动与工业化和城市化	10
2.4 本章小结	11
第 3 章 农民工流动的心理成本及其问卷调查设计	12
3.1 心理成本问题	12
3.1.1 农民工流动动机的一种推测	12
3.1.2 农民工流动模型的比较与启示	14
3.1.3 心理成本的提出	15
3.2 影响心理成本的因素分解	16
3.3 心理成本的操作化定义与农民工调查	17
3.3.1 心理成本的操作化定义	17
3.3.2 农民工调查问卷设计	17
3.3.3 农民工调查组织实施	18
3.4 本章小结	18
第 4 章 影响心理成本因素的理论经验分析	20

4.1 制度因素	20
4.1.1 约束下的行动规则	20
4.1.2 城乡差别与制度性歧视	22
4.1.3 制度对心理成本的影响	24
4.2 信息因素	25
4.2.1 打工信息的路径依赖	25
4.2.2 打工信息的不对称性	26
4.2.3 信息对心理成本的影响	29
4.3 教育因素	29
4.3.1 文化程度的挤出效应	29
4.3.2 新生代农民的生活观	30
4.3.3 教育对心理成本的影响	33
4.4 本章小结	33
第 5 章 农民工流动的政府调控	34
5.1 政府的公共性作用	34
5.2 政府的公共政策取向	34
5.2.1 制度环境的塑造	34
5.2.2 打工信息的网络重构	35
5.2.3 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	36
5.3 本章小结	37
结 论	38
参 考 文 献	40
附 录	45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47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47
后 记	48
个 人 简 历	50

第 1 章 绪论

1.1 农民工流动问题界定

1.1.1 农民工概念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农民工对于大众来说并不陌生。农民工现象产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在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里，农民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中国企业联合会发表的《2003 年全国千户企业管理调查研究报告》表明，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57.6%，其中在制造业中占 68%，在建筑业中占近 80%，在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餐饮业农民工占 52% 以上。

从经济学的角度，农民工被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或农村富余劳动力，即农村中剩余的并外出打工的人口。而统计学上的农村劳动力是指农村男子 16 周岁到 60 周岁、女子 16 周岁到 55 周岁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才被称为农民工。农民工来自于农村，首先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即户籍制度下规定的农民，其次才是一种职业，即城市中事实上的工人^[1]。这种身份是由户籍制度决定的，即使农民进城从事了工人的职业，但其户口仍属于农村户口，只能被称为农民工^[2]。

本文所定义的农民工，是指在城市中正在或者从事过第二、三产业劳动，以此来获得工资收入，但户籍身份是农民并有劳动能力的人。农民工是农村劳动力的一部分，它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是一种部分包含关系，见图 1-1。农民工是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结合，从这层意义上说，只有用“边缘人”这样的概念才能较为准确地描述出这个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3]。

然而对于农民工称谓，国内研究者争议颇多，有人认为这种称谓本身就存在歧视，因而称之为劳工更合理，也与国际相接轨^[4]。本文之所以采用农民工这个概念，是因研究对象决定的，并且根据笔者的农民工调查，大多数农民工对这种称谓并不反感，而使他们反感的恰恰在于，隐藏在农民工称谓之后的更深层次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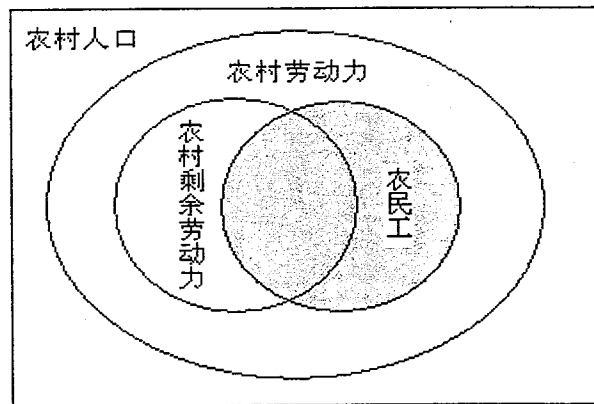


图 1-1 农民工概念界定图

1.1.2 农民工流动的界定

关于农民工流动，有必要从不同学科的不同角度进行比较，人口学更多是从农村人口迁移的角度，经济学更多是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而社会学更多的是从农民工流动的角度进行研究。

在人口学方面，魏津生、张庆五对人口迁移的概念进行了基础性界定，讨论了“迁移”与“流动”的定义问题，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普遍采用。但目前，对人口迁移和流动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仍不统一。而笔者赞同以下界定，即人口流动是指不以改变常居住地为目的的跨越一定地区（地界）的人口移动行为^[5]。

在经济学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转移，转移的方式有本地乡镇企业转移，异地进城转移，异地乡镇企业转移，异地务农等方式，劳动力在改变职业的时候，并不一定发生地理上的迁移行为。

按照社会学的理解，农民工流动是劳动力活动的动态过程。农民工流动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同时是一种社会的流动，包含了地域流动，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三个方面^[6]。

参照上面各学科关于流动的定义，从黑龙江省现实出发，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工流动，更强调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即农民外出打工的过程。因为从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角度观察，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意义远大于回流^[7]。

1.2 研究农民工流动问题的重要意义

农民工流动作为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已经被国内研究者所认同。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的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可以说把农民工问题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流动为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可以说,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同时又是改革未完成的标志性证明^[8]。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尽管劳动力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然而中国农民如果要完全要充分分享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好处,更多的劳动力需要转移^[9]。

据国家统计局 2004 年一季度经济学家信心调查报告显示,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按严重程度排序,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居 17 个问题的第 8 位,属于比较严重的中长期问题。从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农民工问题,意义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 50 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10]。

因此,研究农民工流动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农民工流动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民工流动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这样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进而为推动农业规模经营提供了契机;第二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素质。农民工流动不但为农民增加了收入,而且在打工过程中,农民在城市中学到了技能,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自身素质;第三有利于农村的繁荣。农民工获得收入的大部分都转移回家乡,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消费水平,改善了生活,从而带动农村的繁荣与发展。

黑龙江省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有 746 万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占农村劳动力的 80.3%。由于近年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化肥、农药、生物技术和大型农机具的广泛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这样农村富余了大量劳动力。农业属于弱质产业,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和国际环境双重影响,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支撑力度已经变弱。从全国范围看,外出打工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上升。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工进城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国家实施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粮食安全战略,给黑龙江省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关注农民工现象,研究农民工流动问题,探讨政府公共性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3 国内外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研究综述及评价

1.3.1 国外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对农民工流动的研究大多包含于对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研究上,他们提出了许多理论和观点,试图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机制和成因。在这些理论观点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拉文斯坦(E. G. Ravenstein)等人的推拉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C.H.Fei)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沙斯特德(L.A.Sjaastad)的成本收益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的城乡人口迁移理论等。

(1) 拉文斯坦等人的推拉理论 他们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到城市转移,是农村内部推力和城市拉力两种力量的共同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推力就是存在着迫使居民迁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压力,主要包括农村偏低的所得水平、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农产品交易条件等;所谓拉力就是存在着吸引其他地区居民迁入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引力,主要包括城市较高的收入水平、较佳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等。

(2) 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二元结构。由于工农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着明显差距,农业剩余劳动力必然有一种向工业部门流动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从而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尼斯和费景汉进一步完善了刘易斯模型,使它成较为完整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3) 舒尔茨和沙斯特德的成本收益理论 舒尔茨强调开发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而初等教育对农民特别必要,它是最为基础并具有长远影响的投资,这对农民广泛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沙斯特德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定义为迁移者预期到迁入地会取得比现在多的收益。只有迁移的收益大于成本,人们才能做出迁移的决策。

(4) 托达罗的城乡人口迁移理论 托达罗认为使人们做出流入城市决策的,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收入差异。所谓的预期城乡收入差异,包含

两个因素，一是收入水平，二是就业概率。只要城市收入与就业概率的积大于农村收入水平，人口就会向城市流动。

上述理论产生和发展，是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的产物，但是它们毕竟植根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学者对其所处的特定制度、技术和发展阶段等背景环境下经济现象的归纳提炼^[11]。其特点是：第一，他们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二，他们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因是基于城乡收入差异和心理因素的考虑。这些成果对于研究我国农民工流动问题提供了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但是与我国现实比较可以看出，各国国情、制度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影响农民工流动因素也不尽相同；国外研究重点在劳动力迁移过程上，而我国现阶段重点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上。

1.3.2 国内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研究现状

我国对农民工流动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比较晚，开始 20 世纪 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后。随着大批“民工潮”的出现，农民工问题引起了经济和社会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经济学方面，马侠的《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移》和李梦白等人所著的《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可能是国内最早的研究进城流动民工的专著^[12]。其后有代表性的是从 90 年代起，蔡昉、杨云彦、李实、胡斌、赵耀辉、周天勇等人发表多篇文章，从人口和收入分配角度对农民工现象进行了研究；2003 年，蔡昉、都阳、王美艳主编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民工流动问题进行了制度上的研究。

在社会学方面，从 90 年代起，杜鹰、白南生、李强、赵树凯、李培林、李汉林、崔传义、孙立平、黄平、王春光等人发表多篇文章，从结构分析和网络分析角度对农民工现象进行了理论探讨。有代表性的如李强的社会地位与分层研究，李培林、赵树凯的流动社会网络研究，黄平、文军的理性研究，项飏、李汉林的社区研究，王春光、王晓毅的社会认同研究等。2003 年，李培林主编的《农民工》一书出版，该书对农民工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与阐释，代表了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上述研究者的基本观点总体上比较一致，主要有：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多重因素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流

动等。但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还不一致，主要有：农村劳动力转移途径是城市化还是扩大农村非农就业机会；阻碍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因素；农民流动是否具有理性等。从总体上看，他们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仍没有进行较好地区分；对农民工流动成本研究，仍然集中于具体货币成本讨论上。

1.4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

(1)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以黑龙江省农民工为例，从城乡收入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农民工流动动机角度出发，通过对农民工流动模型的比较，以心理成本为切入点，来解释农民工流动的动机，研究农民工流动问题。本文把心理成本作为假设，并具体分解到制度、信息、教育3个因素层面上。在对心理成本操作化定义基础上，引入社会心理学态度分析方法，通过农民工调查问卷，检验心理成本对农民工流动影响。最后把农民工流动问题同政府公共性联系起来，分析政府的责任和作用，提出政策性建议。

(2) 本文主要结构

第一部分，从农民工概念入手，对农民工流动问题进行界定。阐述农民工流动的重要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二部分，对农民工流动进程综述，阐明农民工流动与城乡收入，农民工流动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

第三部分，从心理成本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假设入手，归纳出影响心理成本的3个因素，在其操作化定义基础上，通过社会心理学的态度研究方法，设计农民工调查问卷，组织实施农民工调查。

第四部分，运用农民工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理论与经验分析，从制度、信息和教育3个因素上，检验心理成本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第五部分，把农民工流动问题与政府公共性联系起来，提出政策性建议。

第 2 章 农民工流动历史综述

2.1 农民工流动进程综述

2.1.1 农民工流动简要历史回顾

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中国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来,农民工流动使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根据全国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 5 个时期:

(1) 控制流动时期(1979—1983 年)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限制,阻碍和束缚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基本制度是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1980 年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及其后下发的文件,1981 年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2) 允许流动时期(1984—1988 年) 1984 年的一号文件出台,表明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制度开始出现松动,其后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允许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了一个较快增长时期。到了 80 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放松和劳动力流动经验的积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13]。

(3) 控制盲目流动时期(1989—1991 年) 政府对前一时期的政策进行了局部调整;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是由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造成城市和乡镇企业就业机会减少,使农村劳动力流动空间缩小^[14]。

(4) 规范流动时期(1992—2000 年) 这一阶段政策强调有序流动,开始实施以就业卡、证管理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就业制度。这一时期是制度性因素和市场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时期,形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高潮期。但 1998 年以后,由于城市下岗人员增加,城市就业压力增大,各地区相继出台了多种限制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规定和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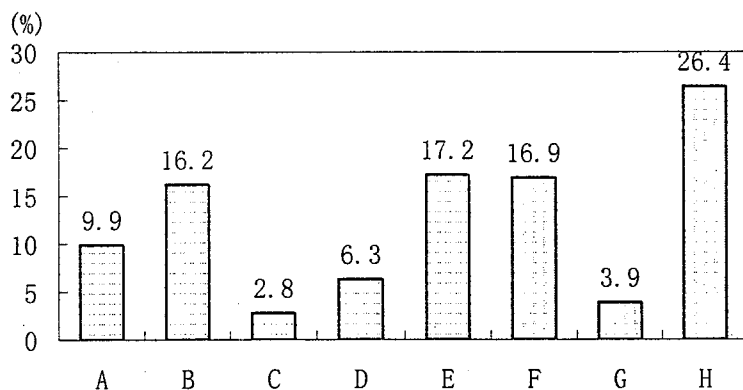
(5) 公平流动时期(2001—至今) 国家对农民工就业政策出现积极变

化,从城乡统筹角度,取消对农民工流动的各种不合理限制。这一阶段特点从宏观结构的角度看,大量农民工的流入城市,表现为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农民工的流入城市并不是政府计划运作的,而是农民工自主的一种选择^[15]。

2.1.2 黑龙江省农民工流动进程与特点

黑龙江省农民工流动是全国农民工流动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黑龙江作为边疆省份,其受计划体制影响要比其他省份深刻得多。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省农民工外出人数较少,大部分农民从事着农业生产。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我省农民工流动才形成一定规模。到90年代末,我省农民工流动区域开始拓展到全国。

全省农村住户调查显示,目前我省外出农民工男性占67.4%,女性占32.6%;农户中子女外出打工占62.0%;外出农民工年龄在30周岁以下占64.5%;农民工一年中在外打工时间6个月及以上占62.9%;农民工外出打工的行业主要有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建筑业和工业等,见图2-1。



注: A 工业; B 建筑业; C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D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E 住宿和餐饮业; F 居民服务业; G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H 其他

图 2-1 农民工外出打工的行业

从黑龙江省农民工流动上看,具有以下特征:

(1) 农民工流动具有滞后性 从历史看,1985—2002年,黑龙江省从事非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二者差额逐年扩大(见表2-1)。这种农村劳动力的产业流动与全国相背离的趋势,体现

在农民工流动上，就表现出滞后性的特点。

表 2-1 非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

(%)

类别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2 年
全 国	18.1	20.6	28.2	31.6	34.1
黑龙江	13.0	13.8	17.7	18.5	19.7
差 额	5.1	6.8	10.5	13.1	14.4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003》

(2) 农民工流动具有季节性 黑龙江省农业地域特点是一年一熟作物。不管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怎样，在每年只种一熟作物的国家里，就会有大量季节性失业的现象出现^[16]。全省农村住户调查显示，农民工一年在外打工回家探亲次数，有 69.8%在两次以内。而在重新外出的流动中，春节、秋收后和春播后是农民工流动的 3 个旺季。

(3) 农民工流动具有单向性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的农民工流动表现出与其他国家类似过程最大的不同点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17]。对于农民工回流，有的研究者认为，事实上，绝大部分回流者回到了传统农业结构之中，返乡创业只是个别现象^[18]。全省农村住户调查显示，2003 年当年返回劳动力仅相当于外出劳动力的 12.4%。农民工在省内打工占 64.6%；在地区级大城市打工占 65.6%。归纳起来，黑龙江省农民工流动以省内单向为主，即主要从农村向大城市流动。

2.2 农民工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从微观上讲，普遍认为农民工流动即是农民进城就业的过程，而农民打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加具有支撑作用。一方面，从农户内部看，外出劳动力户中的一部分劳动力的流出意味着其内部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即非外出的劳动力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外出打工户中的非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率要比非外出打工户中的劳动力高出 3 个百分点^[19]。另一方面，在土地资源流转极为有限、农业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农户收入增加将愈益依赖于农民打工收入^[20]。农民工流动，尤其是季节性流动带来的兼业打工收入，为相当数量的农户带来非经常性的补充收入^[21]。农民工向

家中寄回的现金，补充了农业生产性收入的不足，无论对农业生产，还是对农民生活均起到改善的作用。全省农村住户调查显示，2003年，黑龙江省农民工寄回或带回现金人均2926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2倍。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都在逐渐拉大。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23:1，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为1.52:1。在已有的研究中，普遍的倾向是，不同地区之间农民工流动对本地区的影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流动，进城打工取得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对于抑制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到发达地区后所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22]。总体上看，农民工流动有助于改善城乡之间收入差距。

2.3 农民工流动与工业化和城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特征。农民进城打工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23]。十六大报告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农化就业转变的过程，可以说工业化增加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机会。国外经济发展理论证明，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工业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部门的比重逐渐增加，农业部门的比重逐渐缩小。这种结构转变的显著特征是人口流动，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流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9亿农民向城市流动是一种渐进式的过程，其初期即表现为农民工的流动。

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具体的人口流动包含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第二个过程是迁移者在城市居住下来^[24]。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流动都同时完成了两个过程，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进行。但是在我国，由于一系列制度障碍，非永久性劳动力迁移并没有演变成完整的城市化过程和非农化结果^[25]。而是使其停留在第一个过程，因而产生了农民工流动现象。

上述分析表明，农民工流动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正是通过流动带来的农村劳动力在更大范围内与其他资源相结合，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提高。

2.4 本章小结

本章对农民工流动问题进行了历史综述。首先对农民工流动分 5 个时期作了简要历史回顾，然后从与全国比较中，找出黑龙江省农民工流动的特征；第二分析了农民工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得出农民工流动获得打工收入有助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结果；第三把农民工流动与工业化、城市化联系起来，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阐明农民工流动的重要作用。

第 3 章 农民工流动的心理成本及其问卷调查设计

3.1 心理成本问题

3.1.1 农民工流动动机的一种推测

对于农民工流动以获得打工收入，经济学常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解释农民外出打工的行为选择。成本收益分析的公式为

$$B = \sum_{n=1}^N \frac{I_U - I_R}{(1+i)^n} - C \quad (3-1)$$

式中 I_U ——农民在城市打工获得的收入；

I_R ——农民在家务农获得的收入

C ——流动的成本

则农民外出打工的收益等于其在城市打工收入减去其务农收入与流动成本的剩余部分。劳动力的迁移或流动行为可以从流动的收益和成本两方面进行分析。如果潜在的收益大于成本，那么流动就会发生，否则就不会发生^[26]。根据黑龙江省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见表 3-1），可以计算出，农民工人均收支相抵后收入 3801 元，扣除农民工办理暂住证等行政事业性缴费支出、其他支出等 875 元，则农民工人均打工纯收入（农民工人均带回或寄回现金）2926 元。而农民务农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为 2802 元，根据公式（3-1），计算出农民工外出打工净收益 B 为 124 元；如果农民从事仅为种植业，其人均种植业纯收入变为 2465 元，则打工净收益 B 扩大为 461 元。

表 3-1 农民工人均收支状况

(元)

年份	人均打工总收入	人均消费总支出	人均收支相抵后收入	人均寄回或带回现金	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	人均种植业纯收入
2003 年	5448	1647	3801	2926	2802	2465

资料来源：2003 年黑龙江省农村住户调查资料

上述分析结果显然是农民愿意流动进城打工。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近年

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带动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这样农村富余了大量劳动力。以黑龙江省为例,初步估算农村富余劳动力有446万人,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48%。在此情况下,对于农民进城打工,不仅要从经济学角度考虑,还要社会学角度考虑,因此黄平提出生存理性,即农民为寻求生存甚至维持糊口而非在市场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中国农民在现实面前做出的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27]。而孙立平则提出另一种观点,即普遍的贫困化使得几乎农村中的每个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而不管他们是属于剩余的,还是非剩余的^[28]。从黑龙江省现实看,这种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基于上述原因,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成本收益分析的公式简化为

$$B = I_U - C \quad (3-2)$$

式中 I_U ——农民在城市打工获得的收入;

C ——打工成本

根据公式(3-2),则农民工寄回或带回的现金可以视为打工净收益 B 。这样的结果更加证实了农民愿意流动到城市打工。因此,对于农民工流动动机,如果从城乡二元角度考虑,则城乡之间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基本动因^[29]。但是有的研究者指出,城乡收入差距固然是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持续迁移的动力,但不是惟一的。感受到相对经济地位下降的农户,同时看到外出打工所具有的改善相对收入状况的机会,因此有较强的迁移动机^[30]。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绝对收入差距还是相对收入差距,其带来的结果是农民工愿意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在城市打工获得收入。但是现实中,从微观的角度考察,这种货币化衡量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仍然不能很好地解释农民工流动的决策。按照上面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用城乡收入差异的原因解释,那么农村富余的劳动力都应具有较强的流动动机,尤其是农村最贫困家庭中的劳动力,因为他们的收入与城市打工收入差距最大。但是已有的研究表明,最具迁移动机的家庭也不是最贫困的农户,他们并不倾向于选择劳动力外出^[31]。笔者在农民工调查中也发现,事实中有许多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业生产,即使他们十分清楚进城打工收入比农业收入高,这些农民对于是否流动进城打工有着不同的决策。可以说选择外出打工的农民并非仅仅依照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

在成本收益分析不能很好地解释农民工流动动机的情况下,农民工调查表明,有56.6%的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在一年中未换过工作,有60.5%的农民

工在外出打工前详细了解了打工的需求信息。这可以证明,相当多的人是在已经有了明确就业机会的情况下才从家里出来的^[32]。

尽管农民工本人可能不会对外出打工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考虑,他们从农村出来的理由有时只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对于外出打工有着近乎理性的选择。因而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有一种推测,农民工流动动机复杂性的背后,除了城乡收入差异因素外,其他的因素可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3.1.2 农民工流动模型的比较与启示

(1) 刘易斯模型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传统农业部门的最大特点是剩余劳动力以隐蔽失业或潜在失业的形式存在。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由传统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各种原因的作用,现代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比维持生存部门的平均收入要高出 30%—50%。这些原因包括:第一,城市生活费用比农村高,城市居民要支付较高的水费、房租和交通费等;第二,从农村流向城市就业的劳动力需要部分收入来弥补心理上不适应或心理成本,即从自由、散漫的工作和生活转变为节奏高、受约束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所引起的不适应等。正由于工农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着明显差距,农业剩余劳动力必然有一种向工业部门流动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从而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2) 托达罗模型 托达罗模型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异,是由制度决定的;二是在城市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按照这两个假设,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其动态均衡模型是 $d = w\pi - r$, 其中 d 表示城乡实际收入差异, w 表示城市实际工资, r 代表农村平均实际收入, π 代表一个移民被城市现代部门随机挑选而获得工作的概率。托达罗认为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收益与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这种考虑既包括机会成本,也包括心理成本,即人们害怕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而不愿流动。使人们做出流入城市决策的,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收入差异。所谓预期城乡收入差异,只要城市收入与就业概率的积大于农村收入水平,人口就会向城市流动^[33]。

(3) 比较研究与启示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两个模型都强调城乡收入差异或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异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另外还有一点十分清晰,即两个模型中都考虑了心理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中国现实条件下,许多学者在研究后指出,中国农民工流动并非仅仅是个人决策,而更多是家庭决策的结果。家庭被看作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支持^[34]。家庭作为农民外出打工决策的核心,更强调打工收入的可实现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心理因素对农民的流动可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3.1.3 心理成本的提出

从国内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对于农民工流动,更倾向于中国农民是否外出,是家庭整体决策而非个人行为的结果^[35]。而从家庭角度考虑,影响农民工流动更多的不是农民工的预期收入,而是农民工的流动成本,它包括移动成本(Moving Cost)、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和心理成本(Psychic Cost)等。公式 3-1 中 I_R 可视为农民工流动而放弃的务农收入,即机会成本;而成本 C 中包括移动成本和心理成本,但是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只能计算出可以货币化的移动成本,不能计算出非货币化的心理成本。心理成本即人们对于更换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而需要的心理上的调整,被认为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障碍^[36]。但是在上一节的研究中,对前两种成本分析的结果是,预期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优势,都不能充分解释目前劳动力迁移决策和结果^[37]。对于一个已经离开乡村的外出打工者来说,考虑是留城还是回到农村,其影响因素远非最初决定是否外出时那样单纯,因而也掺杂着更多的非经济成份^[38]。因而综合上述研究,笔者认为,对农民工流动问题有必要转换一种角度,即从心理成本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国内对农民工流动的心理成本研究较少,且处于一般性表述层面上。基于此,本文将对农民工流动的心理成本进行尝试性研究。

农民进城打工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已经被研究者所认同。人力资本在投入生产和服务时,除了体力和智力外,还有一种辅助性因素——心理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体力和智力的物化效果和结果。在心理学上,所谓心理成本就是在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完成一项任务或达到一个目标所投入的情感和人格^[39]。心理成本具有无形性、临时性、价值性、非量化性的特征。

根据上述基础性定义, 本文把农民工的心理成本定义为农民工为获得打工收入所付出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代价。

3.2 影响心理成本的因素分解

上一节给出了心理成本的一般概念。但是为了进一步研究, 必须对心理成本概念进行因素分解, 这样可以明确其具体内涵。

从上述想法出发, 笔者考察了传统的劳动力流动研究, 从选择的角度, 对于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年龄因素, 劳动力年龄与流动成反比, 年轻的人更倾向流动; 二是家庭因素, 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家庭规模扩大成倍增长, 家庭中子女对劳动力流动也是一个限制; 三是教育因素, 在同一群体内部, 较高的教育水平使人们具有较高的迁移率; 四是距离因素, 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与迁移的距离成反方向变化, 这是因为距离越远, 可能流动的劳动者获得工作机会的信息就越有限; 五是职业技术因素, 职业技术水平越低, 其流动性越大因素^[40]。

分析上面 5 个因素可以看出, 前 2 个因素表现出一种自然的规律, 即对于个人来讲, 近乎先天形成的条件, 而个人没有更多的选择, 它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条件; 而对于后 3 个因素, 则是个人在后天学习中完成的, 它是一种可以改变的条件。而且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说, 后 3 个因素显得更加重要。后 3 个因素中, 教育和职业技术因素, 从本质上说, 二者属于同一类别, 即教育的范畴, 距离因素, 主要是距离对劳动力获得工作机会信息的影响, 可以说它是信息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在传统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中, 限制劳动力流动的 3 个障碍是: 政策与户籍障碍、信息障碍和成本障碍。政策与户籍障碍及成本障碍的本身; 更多的体现了在我国现行的二元经济下的制度障碍。

综合上述传统研究, 笔者从影响心理成本的因素出发, 把心理成本归纳到制度、信息和教育 3 个层面上, 并相应地把心理成本划分为心理约束成本, 心理风险成本和心理适应成本 3 个类型。心理约束成本是农民工受到正式约束(制度)或非正式约束所付出的心理成本; 心理风险成本是由于信息不完整造成收入不确定性为农民工带来的心理成本; 心理适应成本是农民工由于自身素质原因, 对城市新的工作、生活环境及人际关系不适应造成的心理成本。

3.3 心理成本的操作化定义与农民工调查

3.3.1 心理成本的操作化定义

上一节把心理成本具体分解到制度、信息和教育 3 个因素层面上。但是为了进行深入研究,必须对心理成本概念建立定量测量的方法,即用一串可以观察、可以测量的指标来模拟它。这就是操作化定义 (operational definition)。通过概念的操作化,非量化的概念得以运算^[41]。

从上述角度出发,笔者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态度测定方法。态度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 3 个成份,对态度的测量即是测量人们对一个态度对象用各种不同方式做出反应。据此把心理成本通过 3 个因素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操作化定义。其中制度因素包括农民工打工意愿、城市歧视、外出打工遇到的困难、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打工获得收入合理性 5 个问题;信息因素包括外出打工前是否了解信息、外出打工信息获取、换工作信息获取、是否签订合同、农民工收入用途 5 个问题;教育因素包括农民工年龄、农民工文化程度、外出打工原因、农民工生活观念、农民工福利待遇 5 个问题。

3.3.2 农民工调查问卷设计

对于心理成本影响了农民工流动的假设,在操作化定义的基础上,现有的统计资料,并不能满足对心理成本研究的需要。因此,笔者设计了农民工调查问卷(见附录)。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 27 个与心理成本相关的客观性问题,来考察农民工对待相关问题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个案形式,对重要问题进行主观访谈,然后综合判断诸因素对心理成本的影响。

对于农民工调查问卷设计,首先是进行假设,即心理成本影响了农民工流动。在此基础上,农民工调查问卷分为 3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性问题,包括农民工性别、打工时间、打工地点、打工地域、打工行业 5 个问题;第二部分是心理成本操作化定义,即 3 个因素相关的 15 个问题。第三部分是共用问题,包括主要支出、打工年收入、被拖欠工资等 7 个问题。总计 27 个问题,其中选择 25 题,填空 2 题。农民工问卷没有设计开放式问题,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农民工群体相对文化程度较低。因此,问卷中的问题应

该尽量简单明了,而且尽量通过选择来缩小范围,使结果更加突出明显。另外,采取农民工个案访谈形式,可以弥补农民工调查问卷的不足。

3.3.3 农民工调查组织实施

如何组织实施农民工调查,获得可靠的数据,是本文经验分析的关键因素。对于农民工调查的方法,从统计角度上,应当考虑大范围抽样调查的方法。但是鉴于目前人力和财力,并且从农民工具有的流动性现实出发,这样进行抽样调查难度较大。因此从可操作性上考虑,笔者对农民工问卷调查主要采取了访谈式问卷调查的方法。选择黑龙江省尚志市亚布力镇的尚礼、八里、双河、永胜4个村进行。并按照4个村农户数量,计算各村调查问卷分配数量,确定在尚礼村发放问卷30份,在八里村发放问卷20份,其他2个村各25份。在尚礼村的30份问卷中,笔者亲自走访问卷20份,亲属代发放10份,其他3个村通过尚礼学校中的学生(家有打工的人),进行问卷调查。农民工问卷调查实施从2004年1月23日开始,至3月30日,历时2个多月。春节到春天种地这段时间,是农民工回到农村的最佳时间,因此考虑把这段时间定为调查时间,符合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其中春节期间完成对尚礼村30份问卷调查及农民工个案访谈,具体过程为,首先了解尚礼村农民工外出打工农户数量,这个数量作为一个调查范围进行编号,然后重点选择适合调查的30个农户,按户进行调查;其他问卷是在农村学校开学后,由学校组织实施的。具体过程为,在尚礼学校重点选择若干个初中年级和小学年级,先调查学生家庭是否有人外出打工及打工者是否在家(尚礼村除外)。然后确定调查范围,对家中有农民工的学生进行编号,然后等距选择70个学生,发放问卷带回家进行调查。

此次农民工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79份,笔者个人实际走访问卷20份。

3.4 本章小结

本章对农民工心理成本和调查方法进行了阐述。首先从农民工流动动机的推测和农民工流动模型比较中,提出心理成本的假设;然后是将其分解到制度、信息和成本3个因素层面上;最后对心理成本概念作了操作化定义,

通过社会心理学的态度研究方法，设计了农民工调查问卷，组织实施了农民工调查，而调查的结果则是经验分析的依据。

第4章 影响心理成本因素的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

4.1 制度因素

4.1.1 约束下的行动规则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制度具体体现在各项制度安排上，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具体化。因而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下，人们必定形成特有的行动规则。所以，要研究黑龙江省农民工流动问题，就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特有的制度下进行分析。现阶段，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42]。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其核心是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43]。可以说，户籍制度是正式约束（Formal Constraints）的典型代表，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预期只能是暂时性的或流动的。

分析现阶段农民工流动的状况，可以有一种判断，并不是像户籍制度等这样的正式约束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正式约束的背后有一种更为粘和的力量，与正式约束一起对农民工流动起着关键的作用，那就是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ts）。非正式约束作为制度构成的另一部分，总是与正式约束相伴而生，并在正式约束环境中得以强化。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即使是现代社会，正式的约束也只占整个约束的很少的一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仍然由非正式规则来约束。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一项主要内容是习惯（Habits）。正是由于正式约束带来的强制性非正式约束，才促使形成习惯性行为^[44]。

在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中，城乡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制度等，都是以制度的形式存在。而制度作为一种正式约束，其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会产生外部性，即制度的惯性会衍生非正式约束，而城乡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直接后果，就是它们共同强化了非正式约束，即形成城市居民的排斥农民工的习惯。在今天看来，城市居民对农民工至少在心理上有一种相对的优越感。这种潜在

城市居民内心的优越感便形成了一种制约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非正式约束，即让农民工从心理上不能适应城市的规则，产生对城市的畏惧感，因而也加大了农民工流动的心理成本。许多研究揭示，多数实现了向城市或发达地区迁移的劳动力，都表示不打算在迁入地长期定居^[45]。大多数农民工表示，他们挣够了钱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去，在家乡办工厂、做买卖，像城里人一样安排生活^[46]。农民工调查证实了上述观点，即使有可能，仍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不愿意生活在城市（见表 4-1）。然后通过这种选择与年龄对应可以发现，更多的年龄较小的农民工愿意生活在城市，而年龄较大的农民工不愿意生活在城市（见表 4-2）。

表 4-1 农民工是否在城市生活的选择

(%)

类别	愿意	不愿意	无所谓
如果可能，是否愿意生活在城市中	40.5	51.9	7.6

资料来源：农民工调查问卷

表 4-2 农民工是否在城市生活的选择与年龄关系

(%)

类别	20 岁以下	20-29 岁	30 岁及以上
如果可能，愿意生活在城市中	50.0	40.6	9.4
如果可能，不愿意生活在城市中	12.8	53.8	33.4

资料来源：农民工调查问卷

下面是尚礼村个案访谈片段：

（张）：没想过到城里去住，我们打工只想挣钱。城里人生活比咱们这块好多了，……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去住，我觉得在那里整天就呆在楼里，一出门就得花钱，……城里人规矩太多，说不清，反正还是在农村好。

上述资料表明，即使在现实条件下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那么在短时间内，农民也决不会大批到城市定居，只能以一种流动的方式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往返。因而那种担心国家对取消农民流动就业限制和歧视性收费，会出现外出就业过分增长现象，没有发生^[47]。正是因为城市观念的影响，农民工才没有过多想到城市中来。农民工调查显示，对于打工收入，他们还是想带回家，主要用于改善家庭和个人的生活、居住及用于婚嫁、子女教育等，

见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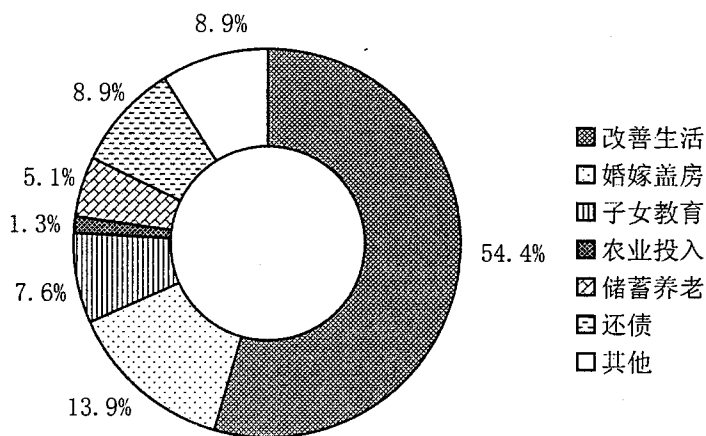


图 4-1 农民工打工收入主要用途

因此，现阶段农民工只能选择在城市与农村间的流动，这就是在约束下的农民工行动规则。进一步讲，如果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的约束下，就发生与城市市民的冲突，这是约束下农民工行动规则的外溢，有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遭遇到来自体制、政策和城市居民等障碍而陷入种种困境和挫折，从而引发失范行为的发生等倾向^[48]。

4.1.2 城乡差别与制度性歧视

关于歧视，按照分隔理论 (Segmentation theory)，至少部分是因为社会上有些人的心理观念对他们有歧视，有些人群被锁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较差部门^[49]。从我国现阶段农民工的状况看，农民工受到了来自城市的多种歧视，把他们锁定在脏、累、差的行业。歧视包括户籍歧视、就业制度歧视、社会保障歧视、教育培训歧视等，这些歧视通称为制度性歧视。

由于中国特有的政策所形成的城乡差别，使农民处于社会分层的下层，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对于政策的影响却很小。因此，即使他们流动到城市中，也会处于不利地位。从总体看，农民工在城市中感受到歧视是相当明显的。农民工调查显示，有 52.6% 的农民工明显感受到城里人的歧视 (见表 4-3)。

表 4-3 农民工受城里人歧视状况

(%)			
类别	歧视	不歧视	不清楚
你觉得城里人歧视农民工吗	52.6	39.7	7.7

资料来源：农民工调查问卷

最明显的表现是城市对流动人口在获取工作机会上的不公平合理待遇：他们实际上被预先排除在许多工作机遇之外——在许多城市中，地方政府都对外来人口工作的行业或职业设置了种种准入限制^[50]。在生活中，歧视农民工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公交和商业零售领域尤其明显^[51]。从电视、广播、报纸的新闻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城市社会管理也严重歧视农民工，它把农民工视为管理秩序因素，收容遣送的主要对象，危及他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52]。这种农民工受到制度性歧视的现象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背离。

上述可以看出，城市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明显存在，但是农民工对于政策的歧视性却持漠然态度，多数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歧视采取的是忍受态度，可心理上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53]。一旦这种心理压力超过他们的忍耐程度，他们便“用脚投票”，从城市返回农村，实施对城市的“退出”机制，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退出”机制是农民在对城市偏向政策的不满程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更为常见的一种反应^[54]。这也是制度性歧视对农民工流动的直接后果。换一个角度，假设消除制度性歧视，那么农民工是否愿意生活在城市中？农民工调查表明，大部分农民工不愿意生活在城市中，农民工对制度性歧视与不愿意生活在城市的相关程度达到 82.9%。制度性歧视影响了农民工的流动，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他们亲身感受到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不同，他们无法迅速适应城市的语言、行为规则，认同各方面的规范和城市人的观念^[55]。与其说农民工不习惯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更不如说农民工不习惯于城市中由于制度性歧视而带来的其与城市居民间生疏的人际交往。农民工调查表明，农民工外出打遇到的主要困难中，除拖欠工资外，认为城里人瞧不起与社会关系少的占近三分之一（见表 4-4）。

表 4-4 农民工在外遇到的主要困难状况

(%)

类别	拖欠工资	城里人瞧不起	生活条件艰苦	缺乏安全感	社会关系少感情孤独	其他
外出打工遇到的最主要困难	31.5	18.4	17.1	7.9	14.5	10.5

资料来源：农民工调查问卷

在已有的研究中，从社会精神支持网的角度，城市居民侧重同事和朋友的精神支持，农村居民则侧重邻居的精神支持^[56]。下面是尚礼村个案访谈片段：

（孟）：我还是不想在城市居住，只想着干完活，挣了钱回家。……虽说地里的农活累，但是咱在农村也自在，想上谁家玩就上谁家玩。……过年过节让我光呆在家里，我肯定憋死了。……城里人好象没有邻居，城市里的人都不认识，听说就是在楼房里的一个门洞住对门都不认识，那是不是什么忙也不帮呀？……就像我，大半个村子的人我都熟，没事尽串门。

因此，农民工不愿意生活在城市中，就是因为制度性歧视造成的农民与城市居民在人际交往等诸多方面的失属感。从这层意义上讲，制度性歧视是农民工歧视的根源。流动农民工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成为事实上的外国人，他们蒙受着浓厚的制度性歧视，以致于被阻止成为他们国家的完全意义上的公民^[57]。

4.1.3 制度对心理成本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制度因素是现阶段影响农民工心理成本的首要因素。制度的存在使农民工在城市中产生一种过客心理，即外来者对生活工作的城市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权利和义务观念淡漠，缺乏对城市的热爱和责任感，进而与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市民产生一种疏离感^[58]。从农民工流动进程看，制度因素使农民只能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而不能在城市长久定居，这也使其停留在劳动力迁移的第一个过程。

另外，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不仅仅在于户籍制度。即使将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破除，他们要想真正进入城市也相当困难的^[59]。这主要由城市居民的观念所决定的。观念作为非正式约束，其变迁速度是很慢的，所以即使取消户籍制度，农民工在城市竞争中也将处于实际和心理的弱势。所以，从长期讲，随着制度性因素的逐渐消除，城市居民观念对农民工

流动的影响将有强化的趋势。可以说，制度因素与其衍生的非正式性约束的存在，加大了农民工流动的心理约束成本。

4.2 信息因素

4.2.1 打工信息的路径依赖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在获得之前无法确定其价值，所以信息搜寻是一项有风险的活动，从而大大限制了人们对信息的搜寻。人们理性的追求是寻求有效的信息而尽量减少搜寻成本。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个人为获得工作变迁机会的信息而严重依赖个人接触的存在背景。个人受到身处其中的社会网络的强大的而不为人所注意的束缚^[60]。

农民工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初次外出之前获得打工信息，有 83.5%通过亲友介绍（见表 4-5）。全省农村住户调查显示，在当年外出的劳动力中，有 61.4%通过亲属介绍外出；全国调查显示，2003 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中，41.3%的劳动力是经亲朋好友介绍。下面是尚礼村个案访谈片段：

（孟）：俺们出去干活，都是熟实人领出去的，我就是同学张某领去的，他在哈尔滨干了二年了，他说他们那个包工头挺好，钱一个月一开，虽然不算多，但是从来不压资。……咱们村都是跟熟人出去打工的，有亲戚，有邻居，有同学。……有时跟熟人都不保准，个人出去打工找活根本没想过，也不知道哪块有活，关键害怕欠钱不给。

表 4-5 农民工初次获得打工信息的途径

类别	（%）				
	亲友介绍	报纸广播电视	劳务中介	政府介绍	其他
初次获得打工信息是通过	83.5	2.5	6.3	0	7.6

资料来源：农民工调查问卷

上述资料表明，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61]。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主要依赖了其传统的亲缘和地缘社会网络，这种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发挥着节约农村——城市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62]。这也表明，农民工外出获取打工信息存在着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理论也指出，一种

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刚性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城市农民工交往和社会支持基本上由强关系构成,其关系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推开^[63]。亲缘和地缘则是维系农民工流动的关键路径,尤其是先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成为农民工流动路径的关键节点,因为已进城的农民工降低了后来者进城的风险。在国外的研究成果中,早期移民对劳动力迁移具有正的影响。因为移民是一个寻找工作的过程,迁移成本和在新的定居点找到工作困难可能由于城市前期移民的存在而得到减轻。城市中这些早期移民成为来自同一故乡潜在移民获得有关迁移信息的重要来源,他们同时为其提供了一定社会环境减轻了新移民生活转变过程中的压力和困难^[64]。即先期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具具有正的外部性。在国外移民网络理论中,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一方面,移民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移民成本和风险可能因此而降低,预期纯收入可能会增加,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65]。所以在笔者调查的过程中,要外出打工的农民对已经在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正式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中的信息网络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外出前就存在的初级乡土关系;二是外出后建立的次级乡土关系^[66]。

4.2.2 打工信息的不对称性

在现实世界中,信息不仅具有不完全的特征,而且还具有不对称的特征。在农民工作出流动之前,他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来获得信息,以便为是否流动进行决策。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缘故,农民工流动的决策不一定正确,而这种不正确的决策必然导致所谓的重复流动(repeat migration),这就是一种社会成本的浪费^[67]。虽然农民工在打工之前都要了解需求的各种信息,但是由于路径依赖,他们通过亲朋好友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或者说仅是其他外出打工者本人的主观感受。而有的农民工是在已经做出外出决策后才了解信息,因此,打工信息的作用十分有限和滞后。同时,对于农民工而言,到底具体何时何地才能搜集到可用的就业信息,其过程是艰苦的。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获得的艰苦性,农民工从节省搜寻成本出发,只能通过最信任的人了解最需要的信息,即通过自己熟悉的亲友引导而外出流动。然而现实中并非所有的农民都有这种可以信赖的关系,没有关系的农民只能是自发外出。全省农村住户调查显示,在2003年外出的劳动力中,有37.1%

是自发外出；全国调查显示，2003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中，55.4%的劳动力自发外出打工。这些自发外出的农民工大多文化水平较低，进城后不清楚该到什么地方找工作，逐渐自发地形成了一些非法劳务聚集点。由于缺乏公开合法的农民就业中介服务场所，带有欺骗性的中介组织得以活动^[68]。农民工调查显示，农民工进城后更换工作的信息，有58.3%通过亲友获得，有16.6%是通过劳务中介获得（见表4-6）。而这些劳务中介大部分是私人性质中介。

表4-6 农民工更换工作的信息来源

类别	（%）				
	亲友介绍	报纸广播电视	劳务中介	政府介绍	其他
进城后换工作信息是通过	58.3	8.3	16.6	0	16.6

资料来源：农民工调查问卷

由于目前正规的劳务中介不仅需要繁杂介绍工作手续和必备的证件，还需求职者参加就业前必要的培训。而非法中介却什么证件都不要，只收取手续费，加之外来农民工找工作心切，往往急于求成，这样非法中介便乘隙而入。通过这样非正规的途径，给农民工带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拖欠工资。农民工调查表明（见表4-4），有31.5%的农民工外出打工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拖欠工资问题，占近三分之一。全省农村住户调查显示，在当年返回的农村劳动力中，有23.3%的农民工是因为要不到工资，无法在城市中维持生活而导致返乡。

据黑龙江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对呼兰170个农户调查，有12.7%的打工者不能按时兑现打工工资。农民工们反映，建筑行业是拖欠工资最严重的行业。另外，由于非法中介不正规的活动，农民工的权益大多得不到保护。农民工调查显示，仅有34.2%的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见表4-7），而且大部分农民工表示，签合同也只是形式上的，根本不正规，真到拖欠工资的时候，合同并没起到真正的法律作用；有65.8%的农民工与用工单位根本没有合同。因此，在拖欠工资发生的时候，他们基本得不到法律保护。据哈尔滨市清理欠款办公室设立的法律援助记录表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近90%的投诉没有任何形式的合同。

表 4-7 农民工外出打工签订合同情况

类别	签订	不签订
打工时你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吗	34.2	65.8

(%)

资料来源：农民工调查问卷

基于上述的情况，大多数农民明确表示，虽然在城市打工工资高于务农收入，但是由于没有可靠的信息渠道，所以还是在家务农种地好，他们认为重要的不是预期收入，而是收入的可实现性。下面是尚礼村个案访谈片段：

(王)：倒是想过出门打工，俺们邻居老李家二小子去年在哈尔滨打工，听他爹说是跟别人盖楼房，好像是学了点技术，装什么消防线，一个月能挣600块，去掉吃喝能剩400块。种地一年挺累的，也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咱们没有把握的人，能引见把握挣钱的活。……咱们村好几个跟朱老大出去打工的，活是干了，没拿回钱，大半年白忙活了。……还不如在家侍弄几亩地，多多少少挣点钱，还是把握的好。

农民工调查表明，黑龙江省农民打工收入仅占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16.4%，农民收入仍集中在粮食生产上，见图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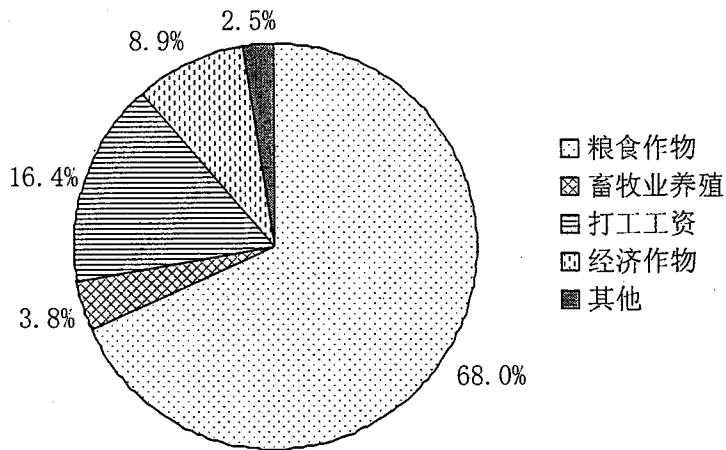


图 4-2 农民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4.2.3 信息对心理成本的影响

综上所述,农民工外出打工所需要的信息具有路径依赖和不对称的特征。因此,考察我省的农民,尤其是有打工愿望却无法外出的农民,可以看出,信息因素的制约作用是巨大的。在那些没有转移的劳动力中,所谓的支付不起的转移成本,实际上也主要是缺乏必要的信息获取渠道,而不是缺乏物质资源^[69]。一些农民不愿外出打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信任的人,即没有可靠的外出打工信息获取途径。另外,农村流动劳动力缺乏信息指导,加大了信息不完全带来的风险^[70]。而这种信息不完全又导致期望收入的不确定性,它与打工信息的搜寻成本一起增加了农民工流动的心理风险成本。

4.3 教育因素

4.3.1 文化程度的挤出效应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农民工被看作是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一种形式。国外经验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面临的主要障碍就是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这种由人力资本不足所引起的不平衡必须通过自身进行改善。现阶段我国农民在实现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流动过程中,农民工素质低下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农民工流动前,其自身的素质水平高低决定了农民工流动的行为与方式,以及其在城市中获得再教育能力的大小。而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中智力部分,则直接取决于文化程度的高低。

分析当前我省农民工文化程度,可以看出,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占外出打工的七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它构成了农民工外出打工文化程度主体,见图 4-3。一方面,由于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比例较大,所以外出的农民工比例也较大;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倾向于首先选择农村本地非农产业就业,其次才是外出就业,最不好选择是本地务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是,在本地非农产业就业得到的尊敬远比外出就业多,外出打工者的临时性成本较高^[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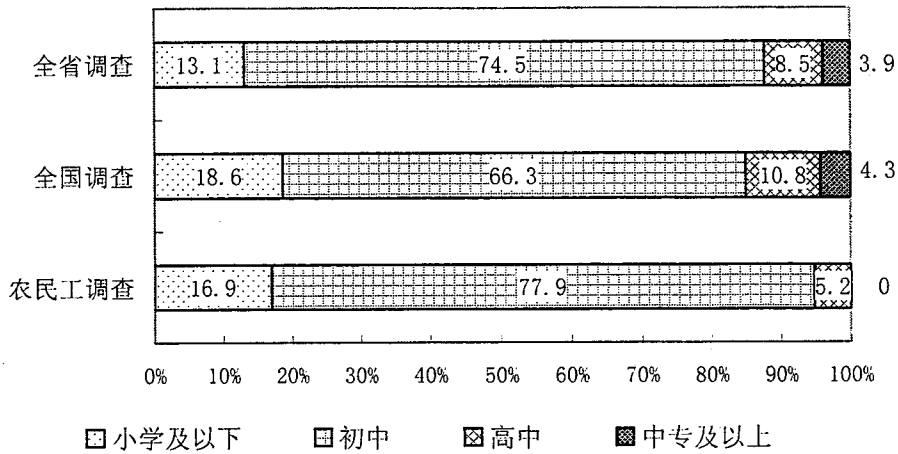


图 4-3 农民工文化程度比较

上述分析印证了文化程度的挤出效应，即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在本地非农产业就业的本身，就对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这也是一种群体内部的排斥力，加速了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对于农民工来说，初中文化程度在城市中显然属于较低的文化层次。而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这种文化程度的挤出效应与农民工较低的素质同时矛盾存在，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根本达不到城市中一些工作岗位的要求，因此他们只能被锁定在脏、累、差的行业和岗位。

4.3.2 新生代农民的生活观

从农民工流动的群体上看，现阶段农具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特征。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是年龄在 25 岁以下、于上世纪 90 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的外出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外出主要是为了改变生活状况和追求城市生活或现代化生活方式^[72]。

农民工调查显示，当年外出打工农民中，30 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 77.2% 以上（见表 4-8）。全省农村住户调查也表明，当年外出打工农民中，30 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 64.5%。综合二者数据，笔者认为，黑龙江省当前 30 岁以下外出打工的农民占 70% 左右，可以说当前大部分农民工正符合

新生代人口的范畴。

表 4-8 农民工的年龄情况

类别	20 岁以下	20--29 岁	30-39 岁	40 岁及以上
外出打工者年龄	34.2	43.0	7.6	13.9

资料来源：农民工调查问卷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动机，农民工调查表明，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原因有了变化：他们认为地少人多，劳动力富余的而外出打工的占 33.3%，认为看别人打工挣钱，生活比自己好，想出去闯闯，增长见识的占 28.2%，认为粮食价格低，投入大，种地不挣钱的占 23.1%，认为利用农闲时间，增加自己收入的占 10.3%（见表 4-9）。

表 4-9 农民工外出打工动因状况

类别	地少人多 劳动力 富余	粮食价格低 投入大种地 不挣钱	利用农闲时 间增加自己 收入	看别人打工 挣钱生活比 自己好	想出去闯 闯增长见 识	其他原因
外出打工的原因	33.3	23.1	10.3	10.3	17.9	5.1

资料来源：农民工调查问卷

可以看出，我省具备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外出动因的已经上升到第 2 位。这表明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的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都比较年轻，至少目前他们的社会义务和家庭责任少得多，更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未来去向^[73]。这部分人中有的从来没有务过农，或者虽然务过农，但对于务农无兴趣。从其家庭背景来看，有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好，甚至相当富裕，外出纯是个人要寻求某种机遇，有的家庭条件并不好，甚至还比较困难，但因为不是家庭主要成员，所以家庭困难抑或是不是困难，都不是由他直接承受，也不构成影响其外出的主导因素，追求个人发展才是其直接的主要动力^[74]。

但是在农民工调查中发现，我省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并不完全与已有研究相一致，他们存在着一种有别于上一代农民工的生活观。下面是尚礼村个案访谈片段：

（吴）：我就是初中毕业出去的，在家也没啥意思，种地我是不愿意干，多累呀，再说种地也不挣钱。……去年我一看，咱们村出去打工的人可多了，

完了我就和张某一起去哈尔滨了。先在建筑工地干了几天下工，太累，我就去了一家烧烤店，当服务生，这活还行，就是一天干得时间太长，后来我又去了一家商场，当保安。……我觉得挺好的，保安发制服，穿起来挺精神。……说实在的，去年也没挣多少钱，可是学了不少社会经验。

从农民工收入看，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除了付出体力来获取打工收入外，没有获得其他收入的机会。农民工调查表明，有 97.4% 的农民工，没有或只有少量福利待遇（见表 4-10）。可以说除了工资外，农民工不享受任何福利保障^[75]。

表 4-10 农民工福利待遇情况

(%)

类别	较多	少量	没有
打工除去工资,你还有其他福利待遇吗	2.6	29.0	68.4

资料来源：农民工调查问卷

尽管是这样，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愿意从农村走出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很少真正务过农，但是农村的生活经历以及农业劳动的艰辛，使他们从内心对于农村和农业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这是促使他们愿意流动或继续在城市打工的一个很直接的动因。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上一代有一定的提高，他们对外界环境信息的了解，比上一代更加全面和深刻，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为现代的生活观。因此，他们对于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动机也就更加强烈。而从他们的季节性返回状况看，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甚至持批评态度^[76]。农民工调查也证实上述观点，如果粮食价格提高到一定程度，仍有 46.8% 的农民工愿意在外打工（见表 4-11）。

表 4-11 粮食价格提高对农民工打工意愿的影响

(%)

类别	愿意	不愿意	不知道
如果粮食价格提高,是否还愿意外出打工	46.8	41.8	11.4

资料来源：农民工调查问卷

4.3.3 教育对心理成本的影响

综上所述,文化程度对农民工具有挤出效应,而当前农民工具备了新生代的特征,一般考虑,这两个方面应该促进了农民工的流动。但在现实中,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并不令人乐观,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教育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对于城市居民乃至他们在城市中寻求工作来说,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又相当低,这不但妨碍了他们在城市中获得工作的机会,而且还加大了他们流动的心理适应成本。从长远发展看,农民工教育是影响个人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大^[77]。另外,由于劳动力从自己的家乡和熟悉的就业领域转移到陌生的地方,进入不熟悉的工作环境,需要克服一系列能力上、心理上的障碍,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具备克服这些障碍的能力^[78]。

4.4 本章小结

本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利用农民工调查问卷的结果,对制度、信息和教育3个因素逐一进行经验分析,证明了心理约束成本、心理风险成本和心理适应成本,共同影响了农民工流动的意愿,从而检验了心理成本对农民流动影响的假设。并通过理论与经验分析,找出各因素对心理成本影响的关键所在。

第5章 农民工流动的政府调控

5.1 政府的公共性作用

在现代经济和社会中，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增进平等。因为在收入分配中，即使市场经济能够发挥作用并且效率极高，它也会带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因此需要政府力量的介入，对收入进行再分配。

从政府职能的角度，对于作为公共问题的农民工流动问题，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实质上是政府如何管理社会或社会如何治理的问题^[79]。从我国现实看，中国市场经济表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中国长期计划体制所形成的制度因素，人为地加剧了不同人群内的不公平性，而不公平性典型表现在城乡收入差异上。正因为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体制，所以在从计划走向市场过程中，产生了农民工流动这样特殊的现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一种现象存在的背后必然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在制度的路径依赖上，导致农民工现象产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机制，社会个体和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没有足够的改变现行制度的激励^[80]。

政府的公共性是政府介入农民工流动问题的基础。应该说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了农民工向城市流动，但是制度、信息和教育因素的存在，却在无形中加大了农民工流动的心理成本，阻碍了农民工的流动，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如果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就会有悖于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而且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必须要把收入的公平分配纳入政府的政策行为，要对农民工流动进行政府调控。

5.2 政府的公共政策取向

5.2.1 制度环境的塑造

研究农民工流动，自然就要涉及公平问题。对于公平，经济学的解释是在经济机会上的平等。而对于农民工流动的公平，更多的是体现在经济机会和社会地位上的双重平等。在市场条件下，初次分配体现的是效率因素，而在再次分配中，比较多的是体现公平因素。我们却发现无论在初次分配环节，

还是在再次分配环节和多次分配环节，城市农民工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上。相对于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而言，农民工的收入是较低的^[81]。农民工调查表明，有 56.9%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付出劳动取得工资是偏低或太低。

从农民工个人的角度，按照心理学习得无助理论，农民工不愿流动是由于他们在长期流动过程中习得无助感造成的。他们觉得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都不足以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所以干脆不再努力。因此，促进农民工流动动机的唯一方法就是设法消除或克服他们的无助感。而消除农民工的无助感，就要求政府发挥公共性的作用。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重点指出，要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可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性障碍会逐步消除，不公平政策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将逐步减弱。但是那种由制度外部性所衍生的非正式约束，并没有得到改变。农民工流动的心理约束成本仍然十分大，农民心理上的城乡差距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缓解。可以判断在今后一段相当长时间，它有可能取代制度，成为影响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的障碍。从变革的速度看，作为非正式约束的观念改变是长期的过程，它只有随着制度的变迁而慢慢消融变迁。

因此，政府必须致力于消除非正式约束的影响，缩短非正式约束变迁的时间。从现实中看，目前政府对农民工流动环境塑造的重点是，在消除制度性障碍的同时，一定要从观念上对城市居民施加影响，从而缩短非正式约束变迁的时间，这样可以降低农民工流动的心理约束成本。

5.2.2 打工信息的网络重构

从对信息因素分析中，可以看出，传统的打工信息获取途径对于农民工节约了搜寻成本，因而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对于这条暂时的路径，从经济学上看，并不是农民工满意的选择，只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传统路径带来的拖欠工资问题和其他路径的高昂搜寻成本使农民工苦不堪言。

政府要引导农民工对信息路径的选择，首先就是降低搜寻成本。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传统的路径中强调政府的作用，增强政府的调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农民工获取信息传统的路径依赖。这就要求政府在构

建农民工获取信息的正规低成本通道中起到协调者的作用。从已有的研究看，政府对农民打工信息的提供，逐渐形成一个持续性互动的自主性网络。这个网络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政府日益从组织者转变为协调者^[82]。因此可以说，政府协调机制发挥作用是改变农民工获取信息路径的重要手段。

政府协调机制对于信息路径的选择至关重要是正的外部性和低成本，即与传统信息路径相比，首先要保证农民工收入的可实现性和农民工获取信息的便宜成本。现阶段对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制定保护农民工打工收入的政策和规范职业中介机构，从而降低农民工在流动中的心理风险成本，为农民获取外出打工信息重构信息网络。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牡丹江市林口县政府组织农民工外出打工案例。林口县政府在拓展外埠用工市场时，严把信息关和输出培训教育关。对全国各地的用工信息严格筛选，考察不合格的市场坚决不输入。林口县政府还在大连、深圳等外埠用工市场设立了劳务输出办事处，建立了定期考察、回访制度，对外出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实行全程监管。林口县农村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个县输出的农民工已赚回工资2.5亿元。

这个案例表明，政府力量的介入，改变了当地农民获取外出打工信息的路径，从根本上解决了路径的锁住效应，进而重构了农民获取打工信息的网络。

5.2.3 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

按照经济学中市场分配的原理，初次分配中获得利益较少的群体，在再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中应得到适当补偿，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从政府转移支付的角度，政府将资源从社会的某些个人与团体手中转移到其他个人与团体手中，起到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的作用。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为国家创造了税收，但是农民工的直接收入却很低。从社会公平角度上讲，政府就有责任通过转移支付把它还给农村和农民工，这是对农民工创造社会价值的肯定和对农民长期处于不公平制度下的一种补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农民工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力资本，必须通过教育这一主要途径。而在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基础教育对农民特别必要，因为它成本低，只有直接成本，没有放弃工作后的间接成本。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具有公共

产品的属性,因此必须由政府进行提供。如果政府不从最大化扩大就业出发,发展和改革教育,提供就业培训,这方面的投资就达不到社会所要求的最佳水平^[83]。

在基础教育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一股“乡村教育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是希望变革农村教育,培养服务于农村建设的人才,从而振兴日益衰落的农村社会。而在现实中,我国也正处于农村经济再次变革时期,政府提高农民基础教育的任务迫在眉睫。无论农民最终会在何处就业,农民都应该像城市人一样拥有同等的积累个人人力资本的机会^[84]。教育的结果会提高农民的素质,进而会降低农民进城打工的心理适应成本,从而达到促进农民工流动的作用。

在农民工职业培训方面,从培训本身看,它确实可以增强农民工素质。但对企业来说,农民工的流动性使得企业进行职业培训必须很谨慎,因为培训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投入具有“溢出效应”,培训完农民工又流动了,所以市场运作的培训规模相对比较小。全省调查表明,农民工最盼望的是政府培训。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也指出,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各级财政要安排专门用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政府对接受培训的农民给予一定补贴和资助。可以说,目前我国在政策层面上已经对农民工的培训做出了具体规定。所以对于农民工培训必须由政府来埋单,这也可以看成国家对农民福利缺失的一种补偿。

5.3 本章小结

本章从政府公共性的角度,对心理成本影响农民工流动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对于农民工的流动,我国现阶段主要政策取向应该是,政府应该利用公共权力,发挥公共性的作用,关键要完成3个步骤:一是为农民工创造制度下的公平机会;二是为农民获取打工信息降低搜寻成本并保障其收入可实现性;三是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加强农民基础教育与农民工培训。

结论

本文从心理成本角度对农民工流动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基于心理成本的研究思路 以往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的研究,大多基于城乡收入差异分析范式,这种范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阶段农民工流动动机。笔者通过对国外农民工流动模型的比较,从一个新的视角——心理成本角度,对农民工流动进行尝试性研究。

2. 农民工调查与态度分析方法的应用 基于对农民工流动动机的推测,笔者把心理成本作为假设。并通过对传统劳动力流动因素的比较归纳,把它分解到制度、信息和教育3个因素层面上。在此基础上,通过操作化定义,并引入社会心理学的态度分析方法,设计了农民工调查问卷,进行了农民工调查。在调查问卷中,通过考察农民工对待相关问题的态度,并结合个案访谈形式,综合检验心理成本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3. 制度、信息和教育因素影响了农民工的心理成本 制度因素是现阶段影响农民工心理成本的首要因素。制度的障碍制约了农民工流动。另外,笔者发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即作为正式约束的制度与其衍生出来非正式约束——城市居民的观念共同制约了农民工流动,并且,随着制度性因素的逐渐消除,非正式约束的影响将有强化的趋势,它们加大了农民工流动的心理约束成本;信息因素的路径依赖和不对称性,使得信息的搜寻成本巨大。而一些农民不能外出打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打工信息获取的艰辛。这种信息获取途径的缺失和搜寻成本的高昂,加大了信息的风险性,导致期望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农民工流动的心理风险成本;教育因素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心理成本。文化程度的挤出效应、农民工新生代的特征和农民工的低素质共同存在,妨碍了他们在城市中获得工作的机会,而且还加大了他们流动的心理适应成本。

从3个因素理论与经验分析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心理成本影响了农民工流动,从而检验了本文的假设。

4. 政府的公共政策取向 对于作为公共问题的农民工流动问题,不能单独靠市场进行自发调节,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进行调控。政府要发挥公共性的作用。首先,要致力于制度环境的塑造,不仅仅需要从制度层面上消除影响农民工流动的政策,而且更需要从观念的层面上,对非正式约束实施影响,以缩短其变迁时间,从而降低农民工流动的心理约束成本;其次,政府要重

构农民工获得打工信息的网络，通过协调机制保证农民工收入可实现性和降低打工信息的搜寻成本，来降低农民工流动的心理风险成本；最后，政府要致力于收入分配的公平，通过转移支付向农村倾斜，加强对农民的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降低农民工流动的心理适应成本。

最后，对于农民工这个典型的社会问题，本文的研究也仅仅是尝试性的。由于笔者本人理论的局限和没有更详细的农民工心理调查资料，尚不能对影响农民工流动心理成本的诸因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也是本文的缺憾。但是对于农民工问题，不仅仅需要政府，而且更需要社会改变观念，给予这一个群体人文关爱，使他们降低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心理成本，最终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化进程，这对于中国的小康社会实现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 1 张智勇,陈秀华.户籍制度、就业歧视与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国改革网.2003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gi-bin/BBS_Read_new.asp?Topic_ID=3253
- 2 曾宪植.我国农民工问题探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 (4):36
- 3 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52
- 4 陈向阳.民工宜改称劳工.南方周末.2004.04.24
- 5 孙福滨,李怀祖.中国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分类界定.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0, (51): 53~54
- 6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1996.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
- 7 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进城.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7
- 8 卢迈,赵树凯,白南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 <http://www.ccrs.org.cn>
- 9 Johnson,D.G. 中国能否通过在农村创造非农工作职位来转移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 1~13.<http://ccer.pku.edu.cn>
- 10 李强.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1
- 11 林毅夫.1999年中国经济学研究评述.经济研究.2000, (11): 69
- 12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1996.中国社会学网. <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
- 13 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经济研究(1955~2000 数据光盘版).1997, (1)
- 14 宋洪远,黄华波,刘光明.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管理世界.2002, (5): 55~60
- 15 李强.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8
- 16 H.迈因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8: 78~79
- 17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 (4): 47~50
- 18 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进城.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7

- 19 李实,魏众.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分配.中国社会科学.1999, (4): 21
- 20 朱玲.非农活动对农户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经济研究(1955~2000 数据光盘版).1992,(3)
- 21 朱玲.非农活动对农户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经济研究(1955~2000 数据光盘版).1992, (3)
- 22 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经济研究(1955~2000 数据光盘版).1998, (4)
- 23 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进城.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7
- 24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制度保障.社会学研究.2001, (4): 47~50
- 25 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中国社会科学.2003, (5): 8~12
- 26 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1955~2000 数据光盘版).1997, (2)
- 27 黄平,郭于华,杨宜音等.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
- 28 孙立平.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几点基本看法.中国社会学网.2003.08. 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xcyj/t20031020_1538.htm
- 29 李强.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3
- 30 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8~39
- 31 Du Ying.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Analysis of Its Features and the Macro Context. in West, Loraine&Zhao, Yaohui(eds.)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2000
- 32 孙立平.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几点基本看法.中国社会学网.2003.08. 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xcyj/t20031020_1538.htm
- 33 叶静怡.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5~72, 113~124
- 34 Rowland,D.T.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gration. i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Edited by Lincoln H.Day and Ma Xia. New York:Sharpe,1994: 129~135
- 35 黄平,郭于华,杨宜音等.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

- 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
- 36 Sjaastad, L.A.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2
- 37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 (4): 47~50
- 38 黄平,郭于华,杨宜音等.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
- 39 李继先.心理成本和心理收益初探——一个解释人类行为的新视角.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 (2): 14~15
- 40 曾湘泉.劳动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58~171
- 41 卢淑华.社会统计学(重排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7
- 42 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中国社会科学.2003, (5): 8~12
- 43 李强.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5~46
- 44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34~45
- 45 Roberts, Kenneth.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Insights from Mexican Undocumented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West, Loraine & Zhao, Yaohui (eds.) *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0
- 46 李强.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5
- 47 崔传义.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民工权益和社会管理改革.中国改革网.2003.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gi-bin/BBS_Read_new.asp?Topic_ID=3176
- 48 陈星博.结构挤压与角色错位.改革.2003, (4): 106~107
- 49 裴小革.论国外劳动经济学中的人文因素.经济研究(1955~2000 数据光盘版).2000, (5)
- 50 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劳动力流动.管理世界.2002, (3): 79
- 51 朱考金.城市农民工心理研究.青年研究.2003, (6): 9
- 52 崔传义.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民工权益和社会管理改革.中国改革网.2003.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gi-bin/BBS_Read_new.asp?Topic_ID=3176
- 53 周春霞.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学研究.2004, (3):54~56
- 54 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中国社会科学.2003, (5): 8~12
- 55 周春霞.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学研究.2004, (3):54~56

- 56 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 (3): 23
- 57 Solinger, D.J.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58 朱考金.城市农民工心理研究.青年研究.2003, (6): 8
- 59 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59
- 60 Granovetter,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1974. <http://www.press.uchicago.edu/cgi-bin/hfs.cgi/00/12738.cfl>
- 61 谭深.农民工流动研究综述.中国社会学网.2003.<http://www.sociology.cass.cn>
- 62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1996.中国社会学网. <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
- 63 李汉林.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6
- 64 Pranab Bardhan and Christopher R. Udry: Development Micro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6~59
- 65 Massey, Doreen.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Jon Bird, Barry Curtis, Tim Putnam, George Robertson and Lisa Tickner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3: 59~69
- 66 赵树凯.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158~205
- 67 Lin Ji-Ping, K.L.Liaw. Labor Migrations in Taiwan: Characteriz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1990 Censu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0: 33~38
- 68 崔传义.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民工权益和社会管理改革.中国改革网.2003.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gi-bin/BBS_Read_new.asp?Topic_ID=3176
- 69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 (4): 42~43
- 70 刘建社, 潘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生产力研究.2003, (3): 25
- 71 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1955~2000数据光盘版).1997, (2)
- 72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社会学研

- 究.2001, (3): 63~70
- 73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 (3): 63~70
- 74 赵树凯.农民流动: 内部成因与生活预期.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
<http://www.ccrs.org.cn/NEWSgl/ReadNews.asp?NewsID=2673>
- 75 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2002.
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zxwz/t20040510_2117.htm
- 76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 (3): 63~70
- 77 李实, 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1999, (4): 15~17
- 78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 (4): 41~42
- 79 崔传义.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民工权益和社会管理改革.中国改革网.2003.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gi-bin/BBS_Read_new.asp?Topic_ID=3176
- 80 徐林清.我国农民工现象的制度分析.岭南学刊.2002,(3): 44
- 81 李强.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50~51
- 82 许平.从政府行为到市场行为——竹镇劳务输出个案研究.李培林主编.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51
- 83 蔡昉.为什么讲就业优先的原则.中国经济信息网.2002.<http://www.cwi.gov.cn>
- 84 Johnson,D.G. 中国能否通过在农村创造非农工作职位来转移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 1~13.<http://ccer.pku.edu.cn>

附录

农民打工情况调查问卷

每题只能选择一个答案：

I 部分：

(1) 被调查者性别：(1)男 (2)女

(2) 外出打工的时间：(1)3 个月以下 (2)3-6 个月 (3)7-9 个月 (4)10-12 个月

(3) 外出打工的地点：(1)大城市 (2)县城 (3)小乡镇 (4)其他

(4) 外出打工的地域：(1)省内 (2)省外 (3)国外

(5) 外出打工的行业：(1)建筑企业 (2)酒店、宾馆、招待所等服务企业 (3)工业企业(含公司) (4)家庭计时工、保姆 (5)机关、院校、医院等机关事业单位 (6)其他

II 部分：

(6) 被调查者家庭最主要收入来源：(1)粮食作物 (2)畜牧业(养殖) (3)打工工资 (4)经济作物 (5)其他

(7) 外出打工遇到最主要的困难是：(1)拖欠工资 (2)城市里的人瞧不起 (3)生活条件艰苦 (4)缺乏安全感 (5)社会关系少，感情孤独 (6)其他

(8) 你认为自己付出劳动所取得工资是：(1)合理 (2)偏低 (3)太低 (4)不知道

(9) 你觉得城里人歧视农民工吗：(1)歧视 (2)不歧视 (3)不知道

(10) 如果可能，你愿意生活在城市中吗：(1)愿意 (2)不愿意 (3)不知道

III 部分：

(11) 被调查者打工挣钱的最大用途：(1)改善生活 (2)婚嫁盖房 (3)子女教育 (4)农业投入 (5)储蓄养老 (6)还债 (7)其他

(12) 获得打工的信息是通过：(1)亲友介绍 (2)报纸广播电视 (3)劳务中介 (4)政府介绍 (5)其他

(13) 换工作的信息是通过：(1)亲友介绍 (2)报纸广播电视 (3)劳务中介 (4)政府介绍 (5)其他

(14) 外出打工前你了解打工的各种需求信息吗：(1)了解 (2)不了解

(15) 打工时你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吗：(1)签订 (2)不签订

IV 部分:

(16) 被调查者年龄: (1)20 岁以下 (2)20-29 岁 (3)30-39 岁 (4)40-49 岁 (5)50 岁及以上

(17) 被调查者文化程度: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 (4)其他

(18) 外出打工的最主要原因: (1)地少人多, 劳力富余 (2)粮食价格低, 投入大, 种地不挣钱 (3)利用农闲时间, 增加自己收入 (4)看别人打工挣钱, 生活比自己好 (5)想出去闯一闯, 增长见识 (6)其他原因

(19) 如果粮食价格提高, 你还愿意出外打工吗: (1)愿意 (2)不愿意 (3)不知道

(20) 除去工钱, 你还有其他福利待遇吗: (1)较多 (2)少量 (3)没有

V 部分:

(21) 除衣食支出, 被调查者在外最大支出: (1)医疗支出 (2)交通支出 (3) 文化娱乐支出 (4)嗜好品 (烟酒等) 支出 (5)其他

(22) 一年打工换过的工作次数: (1)没有 (2)一次 (3)两次 (4)三次 (5) 四次及以上

(23) 一年打工回家探亲次数: (1)一次 (2)两次 (3)三次 (4)四次及以上

(24) 你工作身边有城市人打工吗: (1)有 (2)没有 (3)不知道

(25) 你认为政府出面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有效果吗: (1)有 (2)没有 (3) 不知道

(26) 被调查者年收入: _____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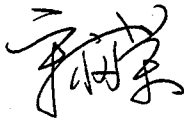
(27) 被调查者被拖欠的工资: _____元

2004 年 1 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此处所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农民工流动及其心理成本问题》，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据本人所知，论文中除已注明部分外不包含他人已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注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将完全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字



日期：2004年10月22日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农民工流动及其心理成本问题》系本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归哈尔滨工业大学所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不得以其它单位的名义发表。本人完全了解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有关部门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哈尔滨工业大学，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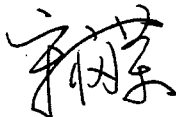
保密口，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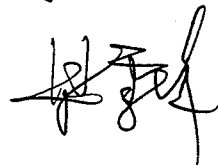
(请在以上相应方框内打“√”)

作者签名：



日期：2004年10月22日

导师签名：



日期：2004年10月22日

后记

文章写完的时候，留下一些感悟和思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里记述的都是你真实的感受。其实要写一篇文章不难，难的是你必须投入全部的热情和真诚。

我出生在农村，二十年的农村生活经历，使我懂得了农业劳作的艰辛；十二年的城市生活经历，让我感受了城市群落的繁荣。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农村，我有一群农民工兄弟，每年假期回到家乡和他们相见，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话题，那就是城乡生活的变化。他们中有我的亲友、我的同学、我的邻居，他们与我闲谈可以无所顾忌，而那些近乎直白浅显的话语却代表了农民最质朴的感叹。是啊，人生下来本无贵贱之分，但是为什么却有城乡的差别？有些人经过努力已经融入了城市的喧嚣，诸如我辈；有些人经过努力依然徘徊于乡村的阡陌，诸如他们。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我走上了漫长的求学路，他们却成了农民工。我和他们喝过酒、聊过天，也一起干过农活。他们不止一次地谈到过城市——繁华与现代的象征。其实他们一直都很艳羡城市的生活，但是对于城市，他们却存在着永远的过客情结。在他们看来，城市虽好，但终究是梁园，他们对城市有着不能承受的心理之重。这难道是他们的错？

我时常听到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指责，没有文化、不讲卫生、不懂礼貌等等。我时常在想，如果生下来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一样，如果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一样，如果农村的人文生活环境和城市的人文生活环境一样，……那么，农民工还有诸多受城里人指责的缺陷吗？这决不是农民工的错！我时常也在想，除了和他们喝酒聊天，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后来有一天在中山快餐吃午饭，不经意间，桌旁坐着的一个农民工大哥说，两个馒头一碗汤，充满阳光！看着他那沧桑的面容，听着他那坚定的话语，在一瞬间我被深深地感动。是啊，简单并快乐着，这就是城市中的农民工。

泰戈尔说，我们在热爱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是的，无论我们是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要坚定地走下去，尤其是我的农民工兄弟。

这就是我的论文主题的缘起。当然，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首先感谢我的妻子和父母，没有他们的付出，我的论文是不可想象的。

在我学习和论文写作期间，我可爱的女儿由出生到患病，是我的妻子和父母承担了生活中的重担，给予我完成学业的信心和勇气，让我终生难忘。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的导师梁雪峰老师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和帮助，并邀请我到家中，对论文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论文几经讨论修改成稿，梁雪峰老师严谨的学风、广博的学识与诲人的品德，使我获益颇多。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我还要感谢米加宁老师、丁云龙老师、臧红雨老师和郑海涛老师对我在工大学习期间指导和帮助。

在我学习和论文写作期间，省统计局副局长李志范、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王森、省统计局工交处处长杜国喜、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葛新、副处长陈君、徐涛、付庆武，对我的学习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鼓励，综合处崔耀志、王绍山、李雪三位同志分担了我的部分工作，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论文写作期间，得益于省统计局原总统计师刘春声、原人口处处长李树萱、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综合处处长李树彬、住户处处长高山对文章观点的启发和历史数据资料的提供，对此我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论文写作期间，感谢我的同学曹景杰帮助我搜集相关文献资料。

在进行农民工调查期间，感谢尚志市亚布力镇尚礼学校校长吴玉国老师对农民工调查的精心组织。感谢尚礼村孟祥波、张连彬等人接受访谈，提供详细的农民工个案访谈资料。

个人简历

宋福荣，男，1973年10月出生，汉族，黑龙江尚志人。1992年考入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1996年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黑龙江省统计局工作，先后任黑龙江省基本单位普查办公室科员，黑龙江省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处科员，黑龙江省统计局综合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现从事全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宏观经济数据库等工作。个人爱好主要有：书法，诗歌，围棋等。